

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

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

古典小说笔记论丛

刘叶秋 著



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

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

古典小说笔记论丛

刘叶秋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小说笔记论丛 / 刘叶秋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8

(津沽名家文库. 第一辑)

ISBN 978-7-310-05825-9

I. ①古… II. ①刘…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8311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运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6 插页 197 千字

定价: 5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刘叶秋先生(1917—1988)

寸土偶空閣在舟室不足迴旋聊堪容
膝可供嘯歌可讀經史雖小何碍縱大言
取泰山滄海微塵涓滴鉅細齊觀佛
家真諦天游在心布衣雄世

丙寅夏日于簷前間隙築室為舟牯設几榻以
資偃息書銘於壁以見自得之樂劉葉秋

出版说明

津沽大地，物华天宝，人才辈出，人文称盛。

津沽有独特之历史，优良之学风。自近代以来，中西交流，古今融合，天津开风气之先，学术亦渐成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院系调整，学科重组，南北学人汇聚天津，成一时之盛。诸多学人以学术为生命，孜孜矻矻，埋首著述，成果丰硕，蔚为大观。

为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天津学术发展的面貌及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津沽名家文库”。文库的作者均为某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所收录的著作或集大成，或开先河，或启新篇，至今仍葆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论著的价值已经从单纯的学术层面生发出新的内涵，其中蕴含的创新思想、治学精神，比学术本身意义更为丰富，也更具普遍性，因而更值得研究与纪念。就学术本身而论，这些人文社科领域常研常新的题目，这些可以回答当今社会大众所关注话题的观点，又何尝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道路点亮了一盏盏明灯。

这些著作首版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十年来多未曾再版，既为学林憾事，亦有薪火难传之虞。在当前坚定文化自信、倡导学术创新、建设学习强国的背景下，对经典学术著作的回顾

与整理就显得尤为迫切。

本次出版的“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包含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五个学科的名家著作，既有鲜明的学科特征，又体现出学科之间的交叉互通，同时具有向社会大众传播的可读性。具体书目包括温公颐《中国古代逻辑史》、马汉麟《古代汉语读本》、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顾随《顾随文集》、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稿》、雷石榆《日本文学简史》、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王达津《唐诗丛考》、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漆侠《宋代经济史》、来新夏《古籍整理讲义》、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季陶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杨敬年《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王亘坚《经济杠杆论》等共二十种。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的更新和学科的进步，某些领域已经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对于著作中的部分观点还需在阅读中辩证看待。同时，由于出版年代的局限，原书在用词用语、标点使用、行文体例等方面有不符合当前规范要求的地方。本次影印出版本着尊重原著原貌、保存原版本完整性的原则，除对个别问题做了技术性处理外，一律遵从原文，未予更动；为优化版本价值，订正和弥补了原书中因排版印刷问题造成的错漏。

本次出版，我们特别约请了各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为每部著作撰写导读文章，介绍作者的生平、学术建树及著作的内容、特点和价值，以使读者了解背景、源流、思路、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原作、获得启发。在此，我们对拨冗惠赐导读文章的各位学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同时，我们铭感于作者家属对本丛书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

创造条件，帮助我们搜集资料、推荐导读作者，使本丛书得以顺利问世。

最后，感谢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领导小组的关心支持。希望本丛书能不负所望，为彰显天津的学术文化地位、推动天津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贡献，为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导读

宁稼雨

恩师刘叶秋先生的《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即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再版，编辑约我写篇导读文章，作为先生在南开大学带过的唯一的入室弟子，我当然义不容辞。

一

先生 1917 年生于北京，原名桐良，字叶秋，号峰莘，因文章均署名“刘叶秋”，故以字行。早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由孙中山创办于 1912 年，初名国民大学，1917 年改名为中国大学）文学系，后在天津《民国日报》任副刊主编，并在天津工商学院女子文学院兼课。1949 年之后，在天津津沽大学、北京政法学院等校任教。1958 年调到商务印书馆参加第二版《辞源》修订工作。从 1958 年到 1980 年，先生因所谓“历史问题”，一直以临时工的身份参与修订《辞源》，以其扎实的学问做了大量工作。直到 1980 年，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原先生力争之下，先生才得以正式国家干部身份成为商务印书馆编审，继续修订工作，并与吴泽炎、黄秋耘先生同为修订本《辞源》三位编纂（主编）。改革

开放后，先生被聘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楹联学会顾问。1980年，经南开大学中文系校友、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黄克先生介绍，先生被聘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1988年，先生因心肌梗死不幸逝世。

从先生的生平履历中可以看出，多方面的经历境遇，尤其是两度编辑生涯，特别是修订本《辞源》的主编工作，形成了先生渊博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他与一般学院派学者的明显不同在于，他不是围绕在一块学术园地上反复深入耕作，而是具有更加广阔的知识视野和多方面专业素养。先生早年在天津《民国日报》任副刊编辑，主要涉猎文学艺术领域和相关人物。当时一些文艺名人都是先生的作者队伍，与先生有很好的专业和人际交往。像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和散文，有许多是经先生之手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的。而先生后来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辞源》主编工作，则又属于语言学、词典学方面的专业领域。按现在的学科划分，语言和文学属于“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近年来还有不少学者呼吁将语言和文学拆分为两个一级学科。一位学者能够在语言或文学中的一个领域深入研究，取得成绩，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可先生在语言学和文学两个主要领域以及其他部分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相比之下，语言学研究应当算作先生的“主要职业”。作为修订本《辞源》主编之一，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建树主要在辞书研究和编纂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参加《辞源》修订工作不久，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的字典》《常用字书十讲》《中国古代的字典》三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字典学专著。此三书在社会上极受欢迎，很快售罄。1978年香港中国语文学社影印《中国古代的字典》和《常用字书十讲》，收入《语文汇编》第十四、十五集中。港台地区其他书店也曾有影印《中国古代的字典》者。美国著名汉学家

周策纵先生将此书列为研究学习《说文解字》的必读书。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以此三书为基础，综合自己及学术界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撰成《中国字典史略》一书。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国内外字典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受到学术界的极高重视。

先生在辞书研究方面最杰出的贡献，还要数他在《辞源》修订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修订本《辞源》三位主编中，商务印书馆占两位（吴泽炎先生和刘叶秋先生）。有人把两位先生誉为《辞源》的“两轮”或“双桨”，认为缺一不可。而商务印书馆的首席代表吴泽炎先生则说：“没有刘先生，不能说《辞源》出不来，但错误要多得多。”使用辞典的人很少理解编辞典之难，尤其是其中的苦衷。16世纪一位法国语言学家写过一首幽默诗来形容编辞典之苦，大意是：“谁若被判做苦工，忧心忡忡愁满容。不须令其抡铁锤，不须令其当矿工。不妨令其编辞典，管教终日诉苦衷。”对于《辞源》这样的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古汉语工具书来说，需要的不仅是这种坐冷板凳的吃苦精神，更需要古代文化的多方面知识，诸如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艺术和人物事件、典章制度，以及风俗习惯、州郡地理、山川形势、天文星象、草木虫鱼等。先生正是具有这种精神与素养的学者。四册《辞源》一千多万字，光逐字逐句地审阅校样，反复就是四遍，更不要说在审稿过程中对全书所进行的各种修改、润饰和加工。如“采访使”一条，原文仅在“官名”的简单解释下，列举三条书证，内容零散，缺乏条理。先生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修改为：

官名。晋石崇曾为交趾采访使。唐开元二十一年分全国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处置使，简称采访使，掌管检查刑狱和监察州县官吏，略同于汉之刺史。天宝九年，改为但考课官吏，不得干预他政。乾元以后，各地兵起，废采访使而置

防御史。参阅《通典》三二《职官》十四《总论州佐》、《文献通考》六一《职官》十五《采访处置使》、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八。

这样的改动，不仅使一般读者对“采访使”的建置演变有了简明的了解，也给专业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线索。

先生历来主张治学要做通人，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1982年我来南开报到，第一次和先生见面，他就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嘱我文学艺术门类众多，但相互间可以启发和补充。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笔法；吴道子由裴昱的剑术，揣出线描的神韵，都能印证此理。先生在读书治学之余，雅嗜颇多，诸如书法、篆刻、作诗填词、鉴赏与收藏字画，以及做印泥、粘扇子、拉琴唱戏等，无所不好。他从蠡县吕梅（熙字）先生认字启蒙，从歙县吴检斋（承仕）先生习语言文字之学，从盐城孙蜀丞（人和）先生学作诗词，从武强孔贺才（培新）先生学作古文及书法、篆刻，又从怀宁邓叔存（以蛰）先生学习鉴赏文物、书画等美术知识。在大学期间，他又聆听顾随、朱自清、俞平伯诸师的教诲，还向叶圣陶、吴玉如、陈邦怀诸先生执弟子礼。善于从诸师学问中择善而从，融会贯通，形成了他渊博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学问功底，使他在相关文史领域中造诣颇深。1949年之前，他在天津《民国日报》上发表过若干谈书画鉴赏的文章。数十年间，他又经常挥毫作书，操刀治印。他曾作《自题印草》七绝一首云：

从来笔阵尤军阵，寸铁纵横百万兵。
一艺自矜还自笑，雕虫射虎两浮名。

既可知其胸襟，又可见其作诗的功夫。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

电视台春节晚会曾举办过几次迎春征春联活动。看过这个节目的观众应该还会记得，先生和程毅中先生、吴小如先生、白化文先生、董洪利先生一起荣膺这个活动的评委，大家都目睹过他赏析佳联、裁夺名句的风采。20世纪80年代在《学林漫录》《燕都》等刊物中也时常见到他回忆京津文坛掌故、风土人情的文章。先生谢世后，师母汪元澂先生将这些文章编辑成为《刘叶秋讲北京》一书出版。先生还曾受王朝闻先生的聘请，为多卷本《中国美术史》的编纂人员介绍历代典籍与民俗对中国美术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曾约他写过《笔记与哲学》的论文……

书外功夫给先生带来了伏案倦读后的消遣，带来了养心健身的调适，更带来了治学上触类旁通的契机。一次，先生在为修订本《辞源》审稿时，看到“渭川”一词，头脑中忽然跳出“渭川千亩”一语。原来，先生在观赏郑板桥和其他古代画家笔下的竹子时，常在题跋或题诗中见到以此词形容竹子繁茂。鉴于其他词典未收此条，先生查书证，找释义，在修订本《辞源》中添上了这一条目。

在诸多雅嗜中，先生用力最勤的要数书法。记得先生跟我说过，他年幼时曾酷爱绘画，但因祖母的劝说而放弃。原来，祖母为大家闺秀，颇擅丹青。她看过先生的绘画后，认为他在绘画方面发展前途不大，便让孙子改习书法。从此以后，他对画便只是欣赏，对书法，却是身体力行。他的字，楷中带行，遒劲挺拔，疏朗舒阔，深得行家的青睐。除经常书写大字外，每天晚上他还坚持用蝇头小楷写日记，多年不辍。1988年春，先生早晨乘公共汽车上班时，因汽车急刹车而将右臂摔伤。在养伤期间，先生试以左手写字，竟颇有异趣，曾用左手书《戏作》一绝，诗云：

西园左笔人争宝，赝作曾由郑板桥。

自笑无端追老辈，居然今古各风标。

很多行家和友人争先向先生索讨左笔书法，先生便将此绝书写后赠送之。程毅中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先生逝世后，程先生追步原韵书挽歌一章：

评联说稗编辞典，甘为他人作渡桥。

两米栖中文百万，遽存遗稿著风标。

二

先生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在古代小说，尤其是文言笔记小说方面。

古代小说虽然算是一个以文体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方向，但实际上其内部又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条线索轨迹。这两条轨迹分别代表了文人士大夫文化和市民文化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其中文言小说起源较早，而且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在历代史志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是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自我消遣之作；白话小说则主要是宋代以来伴随城市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崛起后而面向市民阶层的欣赏娱乐作品。

与传统诗文研究相比，包括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在内的古代小说研究整体起步较晚，体系构建也相对不够完善。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白话小说研究方面分别有王国维、鲁迅、胡适、孙楷第等学者在小说史、作家作品，以及目录学方面有过开拓性的建树，但在文言笔记小说方面，除了个别单篇作品研究外，整体上还是一个空白。而作为中国学界开创文言笔记小说领

域系统研究的第一人，则是恩师刘叶秋先生。

对于先生来说，文言笔记小说研究只能算是一项非本职工作的“副业”。但他的这项“副业”却开创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天地。

从 20 世纪开始陆续问世的几部小说史中（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魏晋南北朝小说和唐代传奇，以及《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等虽然占有一定篇幅，但内容相对简单。这一局面因恩师的学术贡献而出现较大的改变。

先生自幼喜读文史杂书，尤嗜笔记小说。这与祖母对他的影响有关。少年时祖母曾指着北京虎坊桥故居东隔壁的阅微草堂对他说：“如果日后你的读书成就及纪晓岚十之一二，就不错了。”先生不负庭训，年轻时便曾仿《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等志怪传奇笔法，写成若干文言小说，投与报刊，均获刊载。几十年中，他阅读了大量历代笔记与笔记小说，并分别做了读书提要。这为他在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他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 年）、《古典小说论丛》（中华书局，1959 年）两部著作，成为对这个领域系统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20 世纪 60 年代，先生应中华书局之约，为《知识丛书》撰写《中国古代的笔记》一书，完稿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未能付印。至 1980 年，先生将原稿略加修订，易名《历代笔记概述》，作为中华书局《中华史学丛书》之一问世。这是先生的重要著述之一。该书第一次以横向的笔记小说、历史轶闻、考据辩证三个方面和纵向的魏晋至明清一千七百年的线索，将三百五十余部历代具有代表性的笔记梳理缕析，勾勒出中国历代笔记发展的大致脉络。其时，国内有多篇署名文章盛赞此书于学术建设之功。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在《书品》1988 年第四期发表《甘为他人作渡

桥——重读〈历代笔记概述〉》一文，指出：“笔记，爱读的人不少，而精读的人不多；专读某一类作品的人比较多，而兼读各类作品的人则很少。刘叶秋同志学识渊博，读书精细，既熟悉小说故事和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又精研考据辩证类的笔记。尤其他长于训诂诠释之学，还著有《中国字典史略》等书。只有像他这样博览群书，旁通杂学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综合性的概述。”该书一版所印二千七百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北京出版社出版“大家小书”丛书，此书收入其中，还是供不应求。

三

南开大学出版社初创于 1929 年，日寇侵华后，南开大学于 1937 年遭到日军轰炸，学校被迫南迁，出版社被迫停办。1983 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重建。重建后的南开大学出版社急需一批学术名家的重要学术著作来提升学术品位，扩大社会与学术影响。当时刘叶秋先生刚刚受聘担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不久，很快被列入重点约稿专家对象。

当时刚刚重新组建的南开大学出版社编辑以本校转岗的教师为主，负责向恩师约稿并担任责任编辑的是前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马光琅先生。大约 1983 年春季，马光琅先生刚到出版社上任不久，很快通过宁宗一先生与恩师取得联系并约稿，确定出版这部《古典小说笔记论丛》。

这部书稿涉猎的学术领域主要为古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研究，所收文章为恩师在这个领域具有奠基性、开创性和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关于该书内容取材和编排，先生在自序中已有交代，毋庸置疑。这里主要就书中内容的历史背景和学术价值略陈己见。

首先是关于这部书稿及其相关内容的时代特征。先生的小说

与笔记研究起步于 1949 年之前，20 世纪 50 年代是成果集中问世的黄金时期。1958 年之后至本书编纂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因为参加《辞源》修订工作，先生的“笔记小说研究一直为辞书研究所替代”（先生该书自序语）。实际上，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先生的辞书研究和笔记小说研究也都停止了。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辞源》修订工作的重新启动，先生的笔记小说研究也重新开始，陆续为《读书》《文史知识》等有关刊物写过十几篇相关文章。但因为这时先生的主要工作还是修订《辞源》，包括小说笔记研究等其他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所以，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本书结集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几年间，先生的小说笔记研究基本上还是 1949 年之前到 20 世纪 50 年代那二十多年时间厚积薄发的结果。但是这个时段的小说笔记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却具有特殊的意义。

进入 21 世纪之后，学界掀起一股总结回顾 20 世纪学术史的热潮。其中有几种成果都涉及关于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回顾和评价。这些回顾中有未曾引起一个人们关注的短板问题，那就是忽略了对于 1949 年至 1978 年这三十年中学术研究成果的发现与肯定。就中国小说史研究而言，不少研究者把回顾 20 世纪小说史研究的目光集中在 1949 年之前和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对于 1949 年至 1978 年这三十年，则基本上是付之阙如。出现这样的情况固然有其历史原因：1949—1978 年那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含量压倒了学术含量。总体上看，这个时段的学术研究缺少学术含量是个事实。但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一刀切，都有与基本主流相悖的个案和特例。刘叶秋先生的文言笔记小说研究就是这个学术断档时期难得的学术建树特例。据有关信息统计，从 1949 年至 1978 年三十年间，关于中国小说史方面的著作，海外大约有六